

喪家犬的一年

習俗讓思想變得頑固，一如晚霞可以把黃昏帶來一樣。離開故土三十餘年，我都無法認同新的一年是從元月一日開始的。而農曆的春節，在我，那才是真正新一年的開端。因為 2011 年對我的黑暗，彷彿停電的隧道於我的幽深之暗長，所以，對 2012 年春節的盼望，讓我想起青年時期對婚姻的渴望。上一年，先是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孩子，因為不是中國的共產黨員，幾乎無法報考中國任何國家機關的公務員和其他理想的工作，而大學、碩士都是學法律的他，又堅信在中國要有所作為，必先要從國家機關的公務員做起。這讓我想起他在讀大學時幾次想要入黨，都被我婉言的笑拒：「難道人一輩子非要是一個黨員嗎？」憶起這件事情，我時常覺得面對兒子命運開端的遭際，我這個做父親的真應該在那個黨派的面前跪求下來，希望它給那些不是黨員的孩子在工作上予以和青年黨員就業相同的機遇和可能。至少，也再給那些非黨員的孩子們，再多開幾扇就業的門窗。接下來，是我用二十年構思和用二年寫作完成的長篇新作《四書》，如同旅行一樣，投遞、送審了近

二十家出版機構，結果一律被退稿拒絕，理由幾乎如出一轍：《四書》如果可以問世，出版社就有可能在中國逝世。我非常理解這樣的出版現狀，儘管我明白《四書》在我一生的寫作和中國文學中突兀非凡的意義，但還是讓我對《四書》的不能出版，懷着長久的愧歎和不願、又不得不接受的現實糾結。與此同時到來的，是我家房子因為北京發展修路的拆遷。那樣一個急風暴雨的強拆，如同戰爭對一片莊稼、草地、蟲蟻的不屑。沒有人給你看一份需要拆遷的政府文件；沒有人告訴你修公路究竟要佔多少小區的土地；也沒有人與你和言商談應該如何賠償的相關事宜。不管你家房子大小，也不管你家買房、修房時用去了多少錢款，所謂的拆遷補償，一律是一戶人家 50 萬元人民幣，因為你「配合」了政府的拆遷，再獎勵你 70 萬元。這 120 萬元，是個不小的數字，可面對今天北京的房價，它也就是高檔戶區中一個廁所的房款。被拆遷的居民，為此和拆遷人員爭吵、抵抗，誓死捍衛自己的家園和尊嚴。可是，在去年 7 月的清晨，人們還在沉睡之中，小區的圍牆被上百個拆遷隊的漢子突然推倒，當你睜開眼睛時，你的家已經不再在小區之內，而和過往稠密的馬路連在了一起。隨之而來的，是拆遷隊和居民們的扯拉與撕鬥，是有老人被送進醫院救治的殘酷消息；是你家被偷、他家失物的接連與頻發。就連我家，也遇到了一次窗子被撬，一次被人入室

偷竊的「特殊待遇」。報案就像小學生報告老師他丟了鉛筆一樣毫無意義。也不相信偷者是真的盜賊，無非是讓你不能安寧地生活而儘早同意拆遷的一種精妙的舉措。拆遷與被拆遷，就這麼生生僵持，對抗了五個多月，終於政府和拆遷人員向居民們最後下達了不可理喻的荒謬通牒，以那些房子不知道是誰建、又不知誰住的可笑為依據，定其為「違章建築」，將於上年 11 月 30 日為最末的期限，不搬者就一律強行拆除。那一天，居民們憤恨惱怒，家家做好了「人在房在，人亡房亡」的誓死準備。就在這種你死我活的情勢中，我斗膽以一個作家的名譽，給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寫了一封公開的告急信，發在中國的新浪和騰訊微博上，希望萬萬不可在北京首都發生這樣的強拆流血事件；希望政府不要和百姓在拆遷中做這種貓與老鼠的開心遊戲。心裏知道，國家領導就是有慧眼八百，也無法看到那樣一封告急的信件，可也總是期冀着通過成為中國民眼民耳的微博，在那極端事件中暴風雨式的點擊和傳播，從而引來地方政府在拆遷中的警覺與注意。可其結果，那樣一封有史以來一個作家給總書記的第一封求救告急信，在轉瞬間傳遍全國之後，卻像一個響屁放在了空曠的原野。一天的平靜之後，到了 12 月 2 日的凌晨 5 點多，我的鄰居陳先生家裏，突然有幾個頭戴鋼盔、身着統一「特勤」制服的男女，威風凜凜，破窗而入，

把他從床上一吼驚起。在他不同意拆遷的答覆後，就被強行帶走關了起來。而後是快速地清出他家的大件家具，趕在天亮之前就用大型機械把他家的房屋夷為平地，變為了一片廢墟。陳先生後來說，在他被從家裏帶出時，一出門就看見有二百多個特勤人員，各個頭戴鋼盔，把他家的房屋團團圍住時，其實已經預示了弱者在強者面前、百姓在權力面前理抗的結局。所以，之後幾天的抗鬧和到北京市政府的集體冤訴，其實都是一場抗拆敗局的尾聲。如此，三十多戶居民在 12 月不得不同意的拆遷，成為了我一年間人生黑洞最為陰冷暗黑的終結。這讓我相信，一個作家，一個百姓，在現實中的尊嚴，就像一條狗在饑餓時向主人的哀求。法律如隨斷隨扔的草繩。作為公民能夠攥在手中的權利，宛若能夠攥在手中的空氣。我真的想哭！甚至有時會突發奇想，能夠讓我在北京的繁華地帶如長安街、王府井和天安門廣場上痛哭一場，那該是我多麼榮幸的一樁事情。

人就像狗一樣活在這個社會裏。

我就像螻蛄一樣生活在現實中。能夠在小說裏汪汪吠叫成了我的理想，而且又總是渴望把那狗吠的叫聲轉化為藝術美妙的音樂。這種畸形的生活和有些畸形的文學追求，讓我活着並讓我活得時有自信而又總是氣餒無奈，也因此在此過度的精神疲憊中，渴望離開 2011 年的北京，回

到 2012 年老家春節母親的身邊，同那塊鄉村土地上的親人們廝守一起，借他們淳樸的體溫，來溫暖自己在斷電隧道中周身的寒冷、不安和驚恐。今年回老家過年，整整十天，除了必走必串的親戚外，我沒有告訴老家周邊的任何朋友。春節期間，沒有離開過母親和哥嫂半步。一天到晚都同已經八十歲的母親呆在一塊，都同已經退休在家的哥嫂和侄女們呆在同一房屋。我們說笑、聊天、憶舊、打牌，不談工作，不談寫作、不談生活中的任何遭遇和困境，就像大家一切都好，萬事如意般，忘記了過去，疏忽了生活的黑暗，只看見眼前一片的光明和濃烈的親情。連續幾日，一家人都圍着電視，看那日益媚俗的連續劇和春節晚會，雖然媚俗和庸常，親情卻使我彷彿回到了母親的子宮，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平靜、溫暖和沒有焦慮的安全。大年三十吃着餃子的時候，母親把她碗裏的純肉餃子夾到我的碗裏，在她滿是白髮遮掩的臉頰上，映着由衷的滿足和快樂，說這個社會是真的富了、好極了，吃到純肉的水餃和當年貧窮時能夠吃到野菜樣；哥哥是老郵遞員，給人送報送信，騎了半生的自行車，退休之後，在我稿酬的幫助下，買了一輛捷達轎車，初二拉着我去山裏的親戚家裏走串時，問我說現在所有人都對政府憤恨在心，可日子又這麼富足美好，為什麼還都不能滿足呢？兩個姐姐是道地的農民，初三回娘家看望母親時，覺得電視上播的歌頌清

朝皇帝廉明親民的連續劇《新還珠格格》委實好看並藝術，因此也希望我能夠那樣寫作，名利同在，只要寫出一部，就算真正給家人、親人臉上掙得了光亮和榮耀。初六是鄉村正月的黃道吉日，這一天我告別人們與家鄉，不得不返回北京時，所有的親人都來為我送行、道安、說吉祥。母親是每次離別都要流淚的，這一次仍然是淚水漣漣，默默無語，直到當我離開那一刻，她才含淚趴在我耳朵上說：「在外邊，多和當官的人好，不要和人家過不去。」離開之後，哥哥也發給我一個短信說：「因為過年，什麼都沒給你說，你要記住，和誰過不去都別和政府、國家過不去。」回北京，我是開車返回的，因為家鄉的變化，高速公路就修在我家不遠處，因為那兒有一個高速公路交叉口，大姐的孩子怕我走錯路，一直把我送到高速公路的入口處。分手時，他很靦腆地告訴我，說他母親讓他轉告我，回到北京要多注意身體，少寫些東西，實在想寫了，就寫那些歌頌政府和國家的，別年齡越大變得越發固執和傻氣。我對外甥笑着很承諾地點了一下頭，說回去告訴你外婆、舅舅和母親們，都不用替我煩操那份心，說我活得很好，寫作很好，為人也很好，除了皺紋和白髮，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就走了。

開車上了高速路，可開着開着時，莫名地有淚流出來，止不住地想要哭一場。不知道為了誰，就是想要嚎啕大聲地哭一場。便把車停在路邊上，讓淚水橫七豎八地流，撲簌簌在獨自無言的臉頰和內心，直到淚盡止乾，才又開着汽車朝北京的方向奔回來，如一條失家迷路的狗，在高速公路斷電的隧道中，惘然焦慮地喘息和奔跑。

2012年1月31日

國家失記

—

2012年3月，我在香港相遇瑞典教授、漢學家 Torbjörn Lodén 先生，他告訴我說，他在香港的城市大學短期教書，面對教室中的40個中國留學生，他問他們：「你們知道中國的『六四』和劉賓雁與方勵之先生嗎？」那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們，面面相覷，一片啞然。於此同時，我想起香港的另一位老師告訴我，有次她問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們：「你們聽說過在那場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中國餓死了三千萬到四千萬的百姓嗎？」她的這個問題，讓那些學生們不禁啞然，而且面帶驚愕的疑懼，彷彿這位香港教師，正在講台上公然編造中國的歷史，攻擊他們正在日漸崛起的祖國。彼此談完這些事情，我和 Torbjörn Lodén 先生坐在一家安靜的越南餐廳，長久相望，不能聲言。自此之後，那個早被人們私下議論的中國問題——國家性遺忘，便如楔子樣楔入我的頭腦和骨血的縫

隙，時時憶起，都會隱隱聽到體內淌血的聲息，都會有與國家遺忘相關的一連串的問題，馬隊般踏着記憶的血道，狂奔着來到我自責的廣場：

那些出生在八〇、九〇年代，而今都是二十至三十歲的中國的孩子們，是否真的成了遺忘的一代？是誰在讓他們遺忘？他們被遺忘的方法是什麼？我們這些有着記憶的長輩，應該為他們遺忘承擔些什麼責任？

清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感覺遺忘的稱謂，在中國應該被稱為「失記」。因為遺忘更多的是讓記憶拋棄過去和歷史，而失記，則包含着「對現實與歷史選擇的拋去和留存」。是的，正是這個失記的境況，在我的國家，讓新一代的孩子們，成了「有選擇記憶的植物人」。歷史和現實，過去與今天，都在失記和被失記中，使一代人整齊、乾淨、力求不留痕跡的遺忘着。失記和遺忘、真相與失憶，每天都在備受關注的一些語言、文字、頭腦中發生着衝撞和爭奪。我們一直以為，歷史與人類的記憶，最終會戰勝暫時的忘怯，而回到良知的真相中。而事實上，事情卻恰恰相反。在今天的中國，失記已經戰勝了記憶，虛假已經戰勝了真相，臆造早就成為了歷史和邏輯連接的鏈條和接口，就連今天剛剛目睹發生的事情，也在以驚人的速度，被選擇性失記所拋棄，只剩下一些真假難辨的碎片，殘留在社會、生活和人們的頭腦中。

二

必須承認，四九年之後，革命和被革命一直席卷着這個泱泱大國。革命在創造政權，創造歷史，創造現實。而記憶和被記憶，自然失記和被迫性失記，都在國家有選擇的失與記的範疇中，成為一種革命的選擇與手段，被有序漸進地推進和實施。封建歷史的一切，因為都是封建的，帝王將相的，當然就不再提他了。辛亥革命也已經遙遠了，把孫中山的名字留下來，而與這個名字相關、無關的重大事件和歷史之細節，也都從史書和教科書中有選擇地刪去着。就是今天還活着的中國老人都還歷歷在目的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共有哪些黨派、軍隊、志士在前線抗日流血和犧牲，也都被有選擇地記住和遺忘。這一關於失記的行為，是一種國家性策略，及至到了後來，這個國家在以一個人的熱情，帶動着整個民族沸騰的建設中，最早以運動延續戰爭，以革命替代生產的發生在 1951 至 1952 年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官僚主義），因為它為 1957 民族災難的「反右」清理奠定了實踐基礎，因此，關於它和那場直到今天想來都還讓人不寒而慄的「反右」運動，都被強制地從人們記憶的庫房移向了失記的倉庫。而後的大躍進、大煉鋼鐵與隨之而來的遍及